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五七期 ——  
(二〇一〇年七月五日报出)

本期目录 (zk1007a)

【史海钩沉】	山东夺权的“三结合”经验	丁龙嘉
【往事如烟】	只是当时已惘然	礼平·王斌
【史林一页】	百问九一三(十五)	舒云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史海钩沉】

### 山东夺权的“三结合”经验

• 丁龙嘉 •

“文革”中，以1967年上海“一月革命”为起点，全国各地造反派刮起了夺权风暴。这期间，上海、山西、青岛、贵州、黑龙江、山东两市四省的夺权，构成了全国夺权的第一个大浪潮。其中山东的夺权，为毛泽东提出的建立“三结合”政权提供了经验。

◇ 四股势力，在联合与拼杀中，于1967年2月3日夺取了中共山东省委、省人委的权力

“文革”进行到1966年底和1967年初，济南的造反组织开始聚集为两大派，一派是以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山大主义兵”）为首的山东省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总站（简称“山红联”）、山东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简称“山工联”）、红卫兵文艺界革命造反野战兵团；一派是以山东师范学院文革串联红卫兵（简称“山师串联兵”）为首的红卫兵山东指挥部（简称“红山指”）、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简称“山工指”）、山东文艺革命造反司令部。两大派相比较，前者，因为山东大学是1901年建立的直属国家教育部的享誉国内外的大学，所以影响力较强，不仅影响遍及全省，而且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视，其扶持的“山工联”，是由大中型工矿企业的造反组织构成，以产业工人大军而自居；后者，因为山东师范学

院是1950年建立的省属大学，所以影响力较弱，影响主要在济南市，其扶持的“山工指”，是由中小工矿企业甚至街道办企业的造反组织构成。

1967年初，当上海造反派夺取党政大权、掀起“一月革命”风暴时，上述两大派造反组织尚未形成对立，但随着夺权的进展，矛盾日益尖锐起来。省直部门最早起来夺权的是中共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社。1967年1月10日，报社的革命造反联络部在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示范下，夺了报社的权，当时得到了两大派造反组织的支持。夺权后的报社造反派，为了寻求靠山，立即去青岛与毛泽东支持的造反干部王效禹取得联系。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致电祝贺上海32个造反组织打倒市委、进行夺权。13日，“山大主义兵”联合162个造反组织举行“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全面总攻击大会”，并向毛泽东发去致敬电。两天后的15日，“山师串联兵”联合近12万人的造反派举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亦向毛泽东发去致敬电。两个大会，虽然都没有直接提出夺权，但是都在上海“一月革命”的影响下进行了夺权的预演。两个大会，表明两大派造反组织都要以自己为核心，对上争取毛泽东和中央的支持，对下纠集更大的势力。造反派分裂为两股势力，对立开始了。

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2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在中央的推动下，24日上午，两大派造反组织举行会议，商讨联合夺权问题，结果没有达成协议。当天，“山工指”、“山师串联兵”等17个造反组织决定：以自己一派为主夺权，并发表《告全省人民书》，打着大联合的旗帜，号召展开全面夺权。这时，《大众日报》造反派同这一派结合在一起，发表社论表示支持。当天下午，“山工指”、“山师串联兵”和“山工联”、“山大主义兵”两派分别行动起来，到山东省委、省人委和济南市委、市人委以及所属机关单位进行夺权，一时间出现了抢权的局面，在有的地方，还发生了冲突。济南市支持“山工指”、“山师串联兵”的9个造反派组织宣告夺了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组成了“济南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夺权委员会”。当天晚上，“山工指”出动了1万人袭击了“山工联”总部，砸毁了办公机关，绑架了主要负责人等。接着，“山工指”、“山师串联兵”纠集部分造反组织成立了大联合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简称“大联委筹委会”），加紧了夺权的步伐。戴着红领巾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大学生，没有受到民主理念的熏陶，不懂得民主政治的妥协原则，懂得的是“有了权就有一切”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所以他们不可能真正实行联合。工人则尤甚。

为了保证夺权的顺利实现，毛泽东批准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公安六条》。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其中传达了毛泽东的“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的指示。驻济南解放军部队于28日举行了全力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誓师大会。大会在给毛泽东的致敬电中表示：“对于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生死大搏斗，绝不能中立，绝不能折中，绝不能调和，绝不能和稀泥，绝不能不介入。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是要介入！介入！！介入！！！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我们硬是要支持！支持！！支持！！！”致敬电鲜明地表示，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紧跟毛泽东指示，要全力以赴地介入地方夺权斗争。这是第三股势力，一支强大的力量。

以王效禹为首的造反派，在中央支持下，成功地夺取了青岛市委、市人委的权力后，又遵照中央的指示组成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山东省委、省人委大权赴济南代表团，准备到济南。1月29日，“大联委筹委会”在得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要赴省夺权，立即致电表示欢迎，要求他们“带着夺权斗争的丰富经验前来参加夺权的筹备工作，共同并肩作战”，把联合之手伸向了以王效禹为首的青岛造反派。30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山东省委、省人委大权赴

济代表团发出《最紧急呼吁》，号召“全山东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把以谭启龙为首的省委、省人委的权夺过来”！表现出一幅十足的救世主的姿态。这是第四股势力，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当以王效禹为首的青岛代表团于1月31日到达济南时，济南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这一天，“山工联”、“山大主义兵”在集会庆祝青岛市夺权胜利之后，来到省公安厅，要求释放被“山工指”绑架、拘押的负责人，与公安厅革命造反总部形成了对峙。在对峙中，部分人连续两次冲进公安厅办公大楼，砸烂了部分扩音器，割断了部分电话线，并与前去包围现场的解放军指战员发生冲突。傍晚，与公安厅革命造反总部同属一派的“山工指”、“山师串联兵”的大批人员赶到公安厅进行声援，两派遂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当晚，解放军济南卫戍区负责人宣布：“这次袭击公安厅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山东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总部是一个反革命组织，立即取缔”，并当场逮捕了200多人。紧接着，“山工指”、“红山指”、“山师串联兵”等与解放军一起砸毁了“山工联”济南各分会、红卫兵山东造反联络总站。2月1日，济南卫戍区向全省城乡发布《通告》，宣布“山东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总部是一个反革命组织。这次事件是他们有计划、有组织地把斗争锋芒指向无产阶级专政主要工具——人民解放军、公安机关的极为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一三一”事件，使“山师串联兵”、“山工指”这一派造反组织与解放军站在了一条战线上，共同反对“山大主义兵”、“山工联”另一派造反组织。力量对此，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王效禹在青岛造反时，得到了“山大主义兵”的大力支持。他所率领的赴济代表团中，约有1/3的人是“山大主义兵”的成员。他原来打算依靠“山大主义兵”一派夺权，并准备或驻在山东大学，或驻在《大众日报》社。是周恩来安排他们一行驻在济南军区的招待所。王效禹面对着济南两大派造反组织的斗争和部队的倾向性态度，权衡利弊，决定与“山师串联兵”、“山工指”一派结成同盟。在2月1日“山师串联兵”、“山工指”召开的声讨“山工联”总部反革命分子罪行大会上，以王效禹为首的青岛赴济代表团的代表声明“坚决支持济南驻军镇压反革命”。至此，局势迅速演变为：“山师串联兵”、“山工指”一派造反组织，济南驻军，王效禹奉中央指示率领的青岛赴济代表团三股势力合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准备夺权；“山大主义兵”、“山工联”一派造反组织在骤然而至的打压之下，开始崩离析。然而，理念各异、利益不同的三股势力，果真能够实现真正的联合吗？

“一三一”事件的第二天——2月1日，王效禹即同“山工指”的负责人韩金海，既是“山师串联兵”又是“红山指”的负责人王竹泉，省公安厅革命造反总部的负责人花光隆紧急策划夺权。王效禹向他们三人传授了青岛夺权的经验之一——闪电战术，要求抓住“山大主义兵”、“山工联”一派成为惊弓之鸟、一时无法聚集力量之机，仿效青岛夺权，一举夺取山东省委、省人委的权力。

2月2日，“山工指”等25个造反组织的2000多名代表举行了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简称“省大联委”）成立誓师大会，声称夺省委、省人委的一切大权。为了打压“山大主义兵”、“山工总”一派，《大众日报》发表社论，指责他们是“老子天下第一”、“实行霸权主义”、“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

2月3日，“省大联委”召开了有近十万人的大会，宣布夺回省委、省人委领导大权，以谭启龙、白如冰为首的省委、省人委黑司令部彻底垮台。山东省军区司令员童国贵发表讲话，表示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组织、反革命分子的反扑，这显然指的是“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一派。王效禹也发表讲话，指出“夺权斗争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最新特点和中心内容”，表示要“彻底粉碎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这显然指的也是“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一派。军队代表童国贵、造反派代表王效禹同时向“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发出了警告。

大会阐明了夺取山东省委、省人委权力的三条理由：第一，1960年前后，大搞“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包产到户”；第二，在1964年“四清”运动中，推行形“左”实右的路线；第三，在“文革”中，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培植和操纵御用组织，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大规模镇压学生运动的流血事件。今天看来，第一条，是使农民在灾荒中少挨饿少死人的正确之举；第二条，是贯彻中共中央指示而为；第三条，是青岛市委而不是山东省委制造了大规模镇压学生运动的流血事件。但是，欲夺其权，何患无辞。

◇ “二三”政权，在风雨飘摇中，经中央扶持提供了“三结合”的经验

果然不出童国贵、王效禹所料，一度被打懵了的“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很快清醒过来，开始反击。他们集会、游行，反对“二三”夺权，还假造了《北京来电》和“政治谋杀案”，图谋用上压下反的方法聚集力量，进行“反夺权”。

但是，他们此时面对的不只是一派造反组织，还有造反新生的政权和支持这个政权的军队。“二三”夺权的第二天——2月4日，王效禹按照青岛夺权的手法，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发去了加紧电报，称“可能出现一场反夺权的大反扑”。2月6日，王效禹又写信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交由王竹泉送往北京。他在全力争取中央的支持。王效禹同时发表声明，谴责“山大主义兵”、“山工联”，号召“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此时，军队响应毛泽东“人民解放军积极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反对右派”（1）的号召，坚决支持“二三”夺权。2月4日，济南部队领导机关暨全体指战员发表声明，支持“二三”夺权，谴责“山工联”，赞扬青岛革命造反委员会挥师来济、夺权有功。2月5日，解放军指战员和10万造反派在济南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表示“打垮阶级敌人新反扑，誓死捍卫红色新政权”。整个2月上旬，“省大联委”和军队展开了全方位的声势浩大的反“反夺权”行动。济南卫戍区于2月19日发布了《第二号通告》，声称要严厉惩处“山工联”。就在《通告》发布的前后，军队和公安机关拘捕了“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的部分负责人。此前的16日，“省大联委”以反动组织的罪名通令取缔了8个造反组织。

“省大联委”和军队的上述行动，得到了中央的支持。王效禹后来在一次讲话中说，中央文革小组为了保住“二三”夺权，电话指使捉捕“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的负责人（2）。他在又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山东夺权前后正在紧张的时候，毛主席有指示，表示了态度，给我们很大的支持。”（3）

在镇压与围剿中，“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的“反夺权”（又被称为“二月黑风”）很快被平息下去了。

自开始夺权后，具有丰富执政经验的毛泽东，知道只有造反派和军队是不可能有效执政的，就关注干部问题，并提出了“三结合”的政权模式，即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新的政权。

中央关于干部政策的阐述和对干部的要求，使素来“执行正确路线坚决，执行错误路线也坚决”（4）的山东党员干部，特别是省、市机关的干部，纷纷站出来亮相。在“二三”夺权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仅省级机关处以上干部就有近300人站出来支持夺权。这其中有：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穆林，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陈雷、杨介人，山东省委副秘书长王历波，1959年之前担任山东省常委、济南市委第一书记、后被打成右派又获平反的王路宾，济南市人民政府市长杨毅。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指示山东“省大联委”要重视干部问题。在1月31日《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发表的当天，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就电告王效禹：领导班子的

组成，要按社论的精神办；社论的重要一点是正确对待干部；这是毛主席的意见。心中有数  
“省大联委”，开始有选择地吸收站出来的领导干部进入“二三”政权。

夺取省委、省人委权力的“省大联委”，急切地盼望得到中央的认可。中央早一天承认，他们就早一天获得合法地位。2月18日至22日，中央文革小组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听取了山东“省大联委”代表团的汇报。这是第二次赴京汇报。第一次赴京汇报，因准备不足，被中央要求回山东再准备。

18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听取了夺权情况的汇报。20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接见了“红山指”代表，要求他们“主要关心学校的问题，又主要是政治、思想、组织问题”；指示他们“山东大学不是出了问题嘛，你们要考虑怎样去团结、教育、帮助大多数同学”。22日1时，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接见代表团，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代表周恩来和文革小组讲话。他首先说：根据文革以来的经验，请大家考虑，可否建立一个以王效禹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我们看，王效禹同志是可以依赖的。全省集中在以王效禹同志为首的核心的领导下，进一步巩固夺权的成果，让文革更顺利地进行。接着作了五点指示：（一）王效禹从青岛到济南工作；（二）山东省的临时权力机构必须是革命的“三结合”，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三）建议建立“中国共产党山东省核心领导小组”，临时代行省委职权，名单报中央批准；（四）要慎重处理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山东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的基层组织问题，相信你们会处理好的；（五）请发一套新闻报道资料来，经中央审查批准后发布。周恩来最后讲话，他要求：成立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人员在现有的基础上扩大一倍；做产业工人的工作，把大厂子的工人争取过来；农忙季节到了，一定要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省军区、军分区、县武装部要配合一起开；不能成立全国性的组织，也不能搞超单位的组织。他的结束语是：现在宣布各省夺权斗争胜利的消息，都由毛主席审定，今天不可能多谈。（5）看来，以王效禹为首的“省大联委”还得焦急地等待数日。

2月23日，山东“省大联委”改名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有委员60多人，其中常委19人。同一天，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出席了周恩来召集的各大军区负责人谈话会。周恩来要求省、地、县各级都要以军事部门为主，立即行动起来，组织各级生产办公室，领导春耕生产。（6）

2月25日至3月1日，省革委会和省军区联合召开了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军队干部、造反派组织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代表，各占35%、27%、38%。杨得志到会讲话宣布，“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指示以王效禹同志为首组成领导核心”；“周恩来总理指示，当前的春耕生产由各大军区、省军区负责领导”；“组织各级生产办公室，由军区的领导拿总，吸收省里的干部参加……也要吸收农林部门的同志参加。已经夺了权，造反派能够讲话的地方，也要派人参加省、地、县会议，联合起来搞”；“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杨国夫同志参加领导”。会议批判了山东夺权中的“反夺权”观点，意在打压“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王效禹作了会议总结。

就在全省三级干部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山东胜利夺权的消息。第二天——3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山东胜利夺权的消息，并发表了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二三”政权终于获得了合法的地位。

这篇社论说：“山东的经验充分说明，只有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及时地识破阶级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实现军民配合，粉碎他们的假夺权、反夺权的罪恶活动。”所谓革命的“三结合”，即“广大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组织，是夺权斗争的基础”，“革命领导干部，对于夺权斗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强大的靠山”。从此，“三结合”成为建立革

命委员会的一条基本经验。社论有一点十分引人注目，即给谭启龙、白如冰和“山大主义兵”、“山工联”捏造了一项罪名：“他们进行秘密交易，搞什么‘君子协定’、‘和平让权’，以达到幕后操纵，保护自己，继续把持权力的目的”，“演出了假夺权的丑剧”。（7）之所以说是捏造，是因为当时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后来也没有发现有关切实的证据。

山东的“二三”夺权，呈现出几个显著的特点：

（一）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两级军区强力介入、全力支持夺权，在全国是第一家。王效禹在三级干部会议上说：“在整个夺权斗争中，解放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夺权斗争中，没有解放军，我们很难得到山东这样一个夺权的胜利”，“就是把权夺过来，恐怕也巩固不住”。他具体说，我们认为“解放军宣布‘工人联合会总部’是反革命组织，镇压了反革命，对打击反革命起了重要作用，好得很。如果没有这一着，那个反扑不会被打下去得那么快，功劳也应该是归于解放军”。此时，王效禹与军队的关系还处于蜜月期，他说的是实话。

（二）以王效禹为代表的一派造反组织同军队携手镇压了另一派造反组织、进行夺权，在全国开了先河。镇压“山工联”和“山大主义兵”，都是济南卫戍区发布的公告。军队与“山工指”、“山师串联兵”共同摧毁了“山工联”和“山大主义兵”。

（三）镇压与被镇压、夺权与“反夺权”的双方，都以污蔑不实之词欲置对方于死地。镇压、夺权一方，诬称对方与谭启龙、白如冰签订“君子协定”，进行假夺权；“山工联”总部是反革命组织；“山大主义兵”的“反夺权”是阶级敌人的新反扑。被镇压、“反夺权”的一方，假造《北京来电》和“政治谋杀案”，图谋“反夺权”。

（四）众多的山东省领导干部快速地挺身而出、支持夺权，对夺权的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

（五）以一个省辖市的副市长、曾被打成右派分子、从体制内造反出来的王效禹担任山东这个大省的一把手，在“文革”中，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

这五个显著的特点，对“二三”政权的稳定潜伏下了危机。

◇ “三结合”革委会，在理念和利害的搏斗中，名存而实亡

“二三”夺权后，山东军区立即指示各个地区、县的驻军和军分区、武装部参加夺权斗争。“二三”夺权前后，济南军区开始派出部队执行“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简称“三支两军”）任务。3月22日，省革委、省军区联合发布通告，要求全省民兵作为军队方面的代表，积极参加公社以下“三结合”的夺权。仅军队就派出了十几万人支持左派夺权。军队等武装力量参加夺权，甚至以军队为主进行夺权，使全省的夺权进展迅速，从2月3日至2月25日的22天中，全省13个专区和市中，已有7个夺了权；全省112个县和市中，已有62个夺了权，均超过一半。从2月到3月，全省有近10万个单位进行了夺权。

因为以王效禹、韩金海、王竹泉为代表的“山工指”、“红山指”、“山师串联兵”一派造反组织在全省影响力小、势力单薄，而相比较影响力大、势力雄厚的“山工联”、“山红联”、“山大主义兵”又被镇压下去，所以从全省范围看，参加夺权的群众组织有相当大数量是具有保守色彩和中间色彩的。当然，他们也打着造反夺权的旗帜。

作为支左夺权的军队代表和参加夺权的民兵代表，对于谁是革命左派组织有着自己的看法。长期形成的观点和感情，使他们大多数倾向于党团员多、出身成分好、行为稳健的具有保守和

中间色彩的群众组织，不倾于党团员少、出身成分复杂、行为暴烈、造反较早的群众组织。因此，他们大多数认为前者是革命左派，并支持其夺权。

作为支持夺权的领导干部，他们中的大多数，由于长期形成的思想观点和利害关系，不可能通过八九个月的“文革”而转变。这就决定他们与军队代表中的大多数持相同的观点和行为，甚至有的联合军队代表借摧垮“山工联”、“山红联”的下属组织，推垮了所有的造反组织，支持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带有保守和中间色彩的群众组织夺权。

于是，山东全省的夺权，呈现出军队、领导干部、带有保守和中间色彩的群众组织联合夺权的局面；军队、领导干部支持较早造反组织进行夺权的，数量并不多。

夺权之后，相当多数的新政权中出现了与以王效禹为代表的省革委会和造反派的愿望相反的情况。其一，带有保守、中间色彩的群众组织参与掌权，没有造反派的位子。其二，军队代表、领导干部、带有保守和中间色彩的群众组织，借造反派整风的机会，指责造反派自认为的革命行动为错误和罪恶，甚至逮捕了部分人，把一些造反人物整掉；借大联合的名义，把一些造反组织整垮。同时，有的领导干部否认自己犯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甚至要求平反、恢复名义、赔礼道歉。其三，军队代表、领导干部、带有保守和中间色彩的群众组织，依旧采用“文革”前的方式执政，这在省会济南市表现得尤为显著。无疑，上述情况对以王效禹为代表的省革委会和造反派独揽大权构成了严重威胁。

以王效禹为代表的省革委会和造反派很快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自3月中旬开始酝酿反击。他们组织力量在济南市和全省进行调查，如对省立第二医院、济南国棉第三厂、济南百货公司、济南针钉厂进行调查，王效禹亲自到济南国棉第三厂调查，搜集新政权整垮造反派和走老路、向右转的材料。通过调查，得出了结论：中央出现的“二月逆流”反映到济南和全省来了，普遍出现了走资派和保守组织的反夺权，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一股反革命逆流，要采取措施进行斗争，不然，已夺取的政权还有丧失的危险。

这时，中央发生的两件大事影响到全国和山东“文革”的局势。一件是中央文革小组煽动起反对针对“文革”错误进行抗争的几位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的所谓反击“二月逆流”。一件是林彪提出了揪军内走资派。

在上述背景之下，以王效禹为代表的省革委会和造反派在山东发动了粉碎阶级敌人的反革命复辟阴谋的斗争，亦称反复辟逆流。3月25日，《大众日报》发表了社论《迎头痛击反革命复辟的逆流》。3月29日，新华社发表了载于《红旗》杂志第五期的王效禹的文章《放手发动群众，粉碎反革命复辟阴谋》。4月2日，山东省革委会第三次全委会通过了当前全省“文革”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放手发动群众，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反革命复辟阴谋》。

在上述三篇动员令的号召下，一场遍及济南市和山东全省的反复辟逆流迅速展开了。在反复辟逆流中，发生了影响全省的两大事件。

第一件是冲击济南针钉厂。1967年1月31日，济南军区工程兵部队到济南针钉厂支工，支持部分群众组织夺了工厂的权，成立了革委会。反复辟逆流开始后的4月上旬，厂内受到压制、没有参加夺权的一派在“红山指”的支持下起来反夺权。从4月14日开始，“红山指”组织两三千人围攻针钉厂，双方发生武斗，厂内参加夺权的一派中的部分职工遭到殴打。此时，《济南日报》发表了题为《刮起十二级台风，摧毁一切腐朽势力》的评论员文章，将针钉厂说成是“当前济南地区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的典型表现”。15日，省革委会作战部负责人姜庆本以作战部的名义公开发表了《对济南针钉厂问题的几点意见》，表示坚决支持“红山指”

的行动；称针钉厂的夺权是保皇派夺权、假夺权，省革委会作战部不予承认；煽动把权重新夺回来。此后，每天都有数千人围攻针钉厂。21日，济南军区军宣队发表了《关于济南针钉厂文化大革命的几点意见》，称针钉厂的问题，是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工厂夺权问题，从中挑拨省革委会、革命群众组织和军队的关系，妄图制造混乱，扭转斗争大方向。23日，针钉厂革委会被摧垮，参加夺权的一派受到了打压。

第二件是冲击济南市公安局。“二三”夺权后，省公安厅革命造反总部负责人花光隆按照王效禹的指示，成立了专门镇压不同观点群众组织的班子，还以公安厅为主并从济南市公安局抽调20人组成了庞大的调查组，对济南100多个没有参加以王效禹为首一派大联合的群众组织进行秘密调查。在王效禹指挥下，自2月8日至3月底，公安厅直接拘捕了200多人，并公开宣布取缔了部分群众组织。济南市公安局于1967年2月4日被局内一派群众组织夺了权，成立了革委会。夺权后拘捕了一部分人，其中有两人是济南市第三十三中学群众组织“八一战校”的负责人，他们因有打砸抢行为被行政拘留15天。夺权后的济南市公安局，因在某些观点上与省公安厅花光隆一派不同，就被王效禹、花光隆视为保皇派掌权。王、花曾多次派人到市公安局进行分化工作，但都未得逞。在反复辟逆流中，王、花决心解决市公安局问题。3月23日，花光隆以要求尚未进入市公安局革委会、只是参加工作的原副局长李虎汇报工作为名，将李虎等人诱骗至公安厅，然后以镇压第三十三中学造反派的罪名将李虎逮捕。逮捕李虎，遭到了济南市公安局一派干警的强烈反对。王效禹遂调动“山工指”、“红山指”等造反组织的人员，并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从4月15日起对市公安局进行围攻。4月28日，围攻人员冲进市公安局，对部分干警进行侮辱、殴打，致使多人受伤。此时，王效禹下令解散市公安局革委会，由花光隆负责组织班子，重新夺权，成立了符合他们心意的革委会。

反复辟逆流迅速引起军队及其支持的革委会和群众组织的反弹。这时，省及济南市一些受到冲击的革委会和群众组织开始联合起来，已经垮台的被认为是保守组织的“黑字兵”（所戴袖章上的“红卫兵”三个字是黑色的）又拉起了队伍。4月22日，他们在济南组织了10万人的集会，一方面宣称拥护省革委会、拥护解放军，一方面表示对省革委会以反复辟逆流的名义进行打击部分革委会和群众组织的行为要进行坚决的斗争。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笔者目睹的当时的情况，是井然有序、群情激昂。济南部队参加和支持了这次大会。这次集会和游行，不论是阐明的观点，还是喊出的口号，都是讲究策略的；不论是集会的秩序，还是游行的秩序，都是组织严密的，显然有高手指挥、组织。这部分群众组织被称为“四二二”派。

随着反复辟逆流的进行，以王效禹为代表的省革委会、造反派同军队及其支持的革委会、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由公开而激化了。同时，军队内部也出现了分歧。

动荡起来的济南局势，促使中央出面解决问题。4月27日，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在北京接见了王效禹，杨得志和济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负责“三支两军”工作的袁升平，造反组织的代表。周恩来在讲话中，要求军队坚决支持革命左派，说“不强调支持左派，只强调团结、争取保守派，实际上是支持了保守派”；指出“山东省夺权的特点是，有了省革委，但集权没搞好，下面有了二重政权，名义上是由省革委领导，实际上是和省革委顶着，根本不听省革委的”；又指出“全省下面夺权快，只是换了块牌子”；强调“两级军区都要参加省革委，王效禹任主任，杨得志任第一副主任，把省革委的领导统一起来，军队的支左指挥部可以不要了，由省革委统一领导起来”；又专门强调“军队转过来，问题就不难解决了，两级军区应该和省革委站在一起”。〔8〕当天，两级军区即以犯了支“保”错误而被迫做出检讨，同时撤销了军队系统的支左机构。

4月28日，省革委会组织20万人集会，指责“四二二”派反对省革委会，表示要坚决反复辟逆流。刚刚从北京赶回济南的王效禹到会讲了话。他传达了中央支持山东反复辟逆流的



态度；以中央的名义给“山工指”、“红山指”、红卫兵山东文艺革命造反司令部三大造反组织戴上了“左”派的桂冠；表达了中央对“黑字兵”和济南市公安局的态度。这强有力地支持了反复辟逆流和三大“左”派组织，同时也就强有力地打击了“四二二”派组织。

4月28日大会之后，矛盾非但没有降温、解决，反而更为激化了。

为了解决以王效禹为代表的省革委会、三大“左”派组织同军队及其支持的革委会、群众组织日益激化的矛盾，毛泽东直接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姚文元到济南，做各方面的工作，解决山东问题，并当面具体交代了如何开展工作。（9）张、姚于4月30日到达济南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一方面做军队的工作，一方面做两派群众组织的工作。

5月4日晚上，“四二二”派群众组织冲击了《大众日报》社。事件的起因是，4月29日出版的《大众日报》，全文刊登了王效禹等人在4月28日大会上的讲话以及大会决议，将4月22日的大会说成是“一个有计划、有组织地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向省革命委员会、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示威的保守组织的黑会”。于是，济南钢铁厂、济南汽车制造总厂、济南机车厂、济南机床第一和第二厂、济南国棉第一和第二及第三厂的群众组织，“五一”联合兵团，冲击《大众日报》社，进行质问和辩论。这些群众组织都属于“四二二”派。《大众日报》社革命造反联络部指责上述行动是“一伙法西斯暴徒袭击《大众日报》社的反革命事件”，并纠集部分红卫兵组织进行反击。双方在冲击和反击中发生了不严重的殴打。王效禹等阴谋策划扩大事态，鼓动报纸停刊，制造镇压“四二二”派群众组织的借口，但报纸没有停刊，事态没能扩大。这一大规模冲击《大众日报》社的行动，显然，是为了展示力量，给张春桥、姚文元施加压力。这一事件，成为第二天冲击省革委会大院的预演。

5月5日，张春桥、姚文元在济南八一礼堂向群众组织作报告。王效禹等以“四二二”派群众组织冲击《大众日报》社，要保护张、姚安全为由，指示有关人员不得把大会入场券发给“四二二”派。于是，部分“四二二”派群众组织就到省革委会索要入场券，结果遭到拒绝。之后，他们冲进省革委会大院，占据了电话总机室和部分办公室，要求王效禹出面回答问题。在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就高喊“舍得一身剐，敢把王效禹拉下马”！6日，“四二二”派1万多人，在八一广场集会，要求改组省革委会，并伪传“杨得志接管山东一切大权”。会后，调集6000余人去增援占据省革委会大院的人员。显然，是为了进一步展示力量，给张、姚施加更大的压力。这样，公开反对中央支持、部分造反组织支持、解放军不能公开反对的以王效禹为代表的省革委会，就置自己于被动了，而占领省革委会大院，就更错误了。具有政治斗争经验的王效禹，立即于6日下午在省公安厅召集会议，决定驱赶占据省革委会大院的“四二二”派群众组织。于是，“山工指”、“红山指”立即调集二三十万人包围了省革委会大院，掐断了水电。这时，济南军区驻济部队派出宣传车进行劝阻，遭到“山工指”、“红山指”人员的围攻，被迫撤回。7日晨，王效禹派庄中一进省革委会大院宣布“冲击省革委会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之后，“山工指”、“红山指”的大批人呐喊着冲进省革委会大院，对“四二二”派人员展开围攻、甚至武斗，最终将其驱赶出省革委会大院。这期间和后不久，“四二二”派有5人被捕、22人被拘留、200人被关押。这就是著名的“五七”事件。8日，省革委会作战部召开了8万多人的大会，声讨“四二二”派。自此，济南市“四二二”派群众组织及以其为主建立的革委会几乎全部垮台，且迅速影响到全省各地。（10）以王效禹为代表的省革委会和三大“左”派组织认为，“五七”事件标志着反复辟逆流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五七”事件后的两天，即5月9日，中央决定，王效禹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任第一副主任，“山工指”负责人韩金海、“红山指”负责人王竹泉、山东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赵修德任副主任。5月18日，中央又任命王效禹为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兼党委第一书记和山东省军区第一政委兼党委第一书记。6月，中央批准成立山东省革委会党的核

心领导小组，任命王效禹为组长。当时，拥护王效禹的造反派据此大肆鼓吹王效禹的“六个第一”，王效禹也以“六个第一”为资本建立自己的帮派。王效禹一生的政治生涯达到了顶峰。据说他一生念念不忘自己的“六个第一”，到晚年时还说：“我那六个第一是党中央毛主席给的。”可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到达顶峰之时，也是走下坡路的开始。

为了维护大局，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领导机关，多次在肯定“三支两军”取得成绩的同时，检查所犯错误，承诺支持王效禹、省革委会、三大“左”派组织、革命的“三结合”，时称“四个支持”；表示反对把斗争矛盾指向王效禹、省革委会、三大“左”派组织，时称“反对三个指向”。这主要有5月28日山东省军区发表的《声明》和6月7日济南军区党委发出的《给山东革命群众的一封信》。

“五七”事件之后，军队似乎转向了，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实际上，他们与以王效禹为代表的省革委会和三大“左”派组织之间的分歧依然十分深刻。袁升平在若干年后说，“五七”事件后，王效禹和三大“左”派组织搞了一个“老保冲击省革委罪行展览”，王效禹要杨得志、袁升平通知济南军区常委会成员前去参观，常委们付之一笑，无一人前去，王效禹得知后说：“军区就是不支持我”；王效禹等企图将“五七”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并拟好了文稿，要以省革委会和济南军区的名义联合下达通知，济南军区拒绝签署，并与之进行了斗争。（11）尖锐的矛盾暂时潜伏下来。

在反复辟逆流中，结合进革委会的领导干部经历了一场惊涛骇浪。他们或者站在以王效禹为代表的省革委会和三大“左”派组织一边，或者违心地站在他们一边，留在革委会内；或者站在他们的对立面，或者不完全苟同他们的所作所为，被从革委会中清除出去，别无选择。在省革委会的常委中，被结合的王历波、王路宾两位领导干部和庄中一位军队干部，在“二三”夺权和反复辟逆流前期，是支持王效禹和三大“左”派组织的，但在反复辟逆流后期，面对他们支一派压一派、妄图独揽山东大权的劣迹和专横跋扈的作风，提出了不同意见，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就在1968年1月被他们打成“王王庄反革命集团”，在全省进行批判，之后，被撤销职务、投进监狱、隔离审查。被结合的另一位领导干部李予昂，在1967年12月被以莫须有的“叛变自首”的罪名清除出省革委会。如此，省革委会内的领导干部就寥寥无几了。

全省反复辟逆流的激烈搏斗，经过整整的春夏两季后，逐步和缓下来，但斗争并未止息。到10月，据王效禹向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汇报情况时说，全省112个县（市），有105个夺了权，有4个尚未夺权，有3个不需要夺权。到11月，据山东赴江西代表团介绍情况时说，全省13个地（市），有12个夺了权，建立了革委会和筹备小组；经过半年多的斗争和反复，绝大多数地区的权已经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形势很好；个别地区，目前两派斗争还比较激烈，还没有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如此提供经验的“二三”政权系统的“三结合”，已是名存而实亡的“三结合”。一部“文革”史表明，从山东到全国从未出现过毛泽东提出来的那样的“三结合”政权：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12）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探索的悲剧。

注释：

（1）、（12）《红旗》杂志1967年第3期、第5期社论。

（2）、（3）、（9）王效禹1967年8月17日、10月26日、11月7日讲话。

（4）《踏上改革开放之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164页。

（5）、（8）、（10）参阅《中共山东历史大事记》（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517、第523、第524至525页。  
(6)《周恩来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131至132页。  
(7)《人民日报》1967年3月2日社论。  
(11)《革命史资料》,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增刊1第8页

□ 《炎黄春秋》2010年第6期

~~~~~

## 【往事如烟】

只是当时已惘然

• 礼 平 • 王 斌 •

口述：礼平  
采访：王斌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触及红卫兵运动的长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一问世就名重一时,引发了文坛内外广泛、深度的争论,构成新时期奇异、难忘的文学景观之一。时隔三十多年,该书作者礼平讲述了作品创作的过程和他所知的一些红卫兵运动的荣衰往事,读后让我们有一种“返身”历史现场的感觉。

### ◇ 生活中的原型与我作品中的人物差距都不太大

许多年来不少读者朋友一直关注《晚霞消失的时候》这部小说后面所触及的一些隐秘的东西和真实背景。我没什么刻意要回避的。我承认我有过一些不太寻常的经历,见过、认识和接触过一些不同寻常的人。不少事情让我刻骨铭心。这都是那部小说的故事来源。我那篇小说的原型与我作品中的人物差距都不太大。至少我觉得我将他们的风貌写出来了。我为此深感满意。

我的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写的,满篇都是“我”如何如何,读者当然也就会认为这是本自传体小说。其实不全是这么回事。一开头的故事是真实的。只不过那不是我的经历,而是我一个朋友的。那是一个挺出色的家伙,学习不错,大度豪爽,一身的侠气,和作品中的“我”一样。文化大革命一起,他带着一帮同学将他一个邻居的家抄了。他父亲是我军一位战功赫赫的中将,军史上很有名气,我就不提名字了。但这个朋友的名字我可以告诉你,他叫唐双津。我的小说写的就是他。我的朋友们全都知道这件事。唐双津家住在景山后街米粮库,这个胡同现在还在。

那位邻居家是一个旧将领世家,祖上从前清到北洋一直到国民党的杂牌军,三四代都是军人,最高军阶也是中将。我想他们两个中将之家,虽然来自不同的阵营,但同为军人,多少总会有些英雄相惜之慨吧。

谁知文革一来,唐双津和谁都没打招呼,就将人家的家抄了。他冷不丁来了这么一手,校革委会挺着急,我忘了是孔丹还是秦晓,要不就是周坚,他们都是我们学校革委会的负责人,也是学生领袖,赶紧叫人去现场了解情况,我就去了。

红卫兵运动从一开始就不是铁板一块。当时我们学校的革委会刚通过决议,绝对不许抄家,不许打人,不许武斗,可唐双津就公然去抄家了。等我赶到时,抄家已近尾声,他们正在审问那个老军人。那些情景我都写进了小说中。我写得相当真实。我有一个朋友叫国少庄,他那天也去了。当时唐双津谁的话都不听。后来国少庄看到我的小说,不知道是我写的,还拍着那本

书跟我说，这个小说的作者那天一定也在场，他肯定参加了那次抄家。你就知道我写得有多真实了。

当时的情景充满了戏剧性。他们搞得挺像那么回事，十几个中学生将那个老军人绑起来，还蒙了眼，让人家跪在地上，一板一眼地审问。问着问着，老人的讲述就将我们全都俘虏了。抄家的也不抄了，劝阻的也不劝了，全都挤在屋子里听。那个老将军说的往事在我们的面前展现出一个逝去的时代，让我们听得入迷，出神，大家挤了满满的一屋子来听他讲故事。那真的是一个不眠之夜。那个老头儿从跪着改为站着，从站着改为坐着，后来还有人冲了杯茶端给他，好让人家接着给我们讲故事。这就是少年人做的事。可恨起来真可恨，可爱起来也蛮可爱的。

也就是在那一天，我平生第一次接触到了南珊那一类的人物，具体讲就是那些旧世家的落难小姐，她们有着深厚的家世背景却掉进卑微的社会现实，就是这样的一些女孩子。这样的女性在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在外国的文学作品中也不少。那个院落不大，东边的厢房据说住着他家的两个孙女。人没有见到，不知被他们赶到什么地方去了。但那间被翻得乱七八糟的闺房还能看出原先的整齐与素洁，这就足以说明女主人的修养了。这两个未曾谋面的女孩子应该说就是我所写的那个南珊的原型。但是人我没有见到，我描写的南珊来自别的想象。

◇ 江青文革中一出来就让人腻歪透了

现在的人讲起红卫兵运动来，以为就是一大群不懂事的孩子在瞎胡闹。这么说也对，但却不是历史，而只是一个概念。红卫兵运动有它的复杂性，红卫兵怀疑过，震惊过，思考过，也反抗过。这都是历史。在他们当中，至少是有好些学生领袖从一开始就在怀疑、震惊、思考和反抗着了。我将这些人称为红卫兵中的理智派或者冷静派。红卫兵中的另一些人是疯狂派。这两派的能量都不小，只不过他们还没来得及冲突和碰撞，就土崩瓦解了。

当时我们四中有一个学生领袖群体，都是高三的学生，为首的是孔丹，在文革中写过文章，办过报，组织过团体，很有才华的一个人，文革前是北京市的学习标兵。在他身边聚集了一批精英学生，像马凯、薄希永、秦晓、李三友，等等，都是当时的高材生。我们这些当年的校友直到现在还团聚在他们身边，就知道他们的威信和影响了。另外还有八中的陈晓鲁，六中的董良翮，都是文革初起时的理智派。在我的印象中，陈晓鲁差不多从一开始就到处泼冷水，老是说：“这是干什么啊？你们瞎闹什么啊？有什么意思？”对文革是无奈和不屑。我们学校还有个徐小岩，是徐向前元帅的儿子，还有杨东明是杨成武上将的儿子，都是高材生，在同学中也很有影响，但就是什么话都不说，什么事都不参加，看都不看，问都不问。后来徐帅卷进二月逆流，杨成武被难，他们也是什么话都不说，什么态也不表。这就是彻底的理智派。孔丹他们那一帮人热情洋溢，想要在文革中做些正面的事，结果差点送了命。孔丹和董良翮后来都被中央文革抓了起来，1967年他们的判决都拟好了，要不是周总理干预，他们肯定死在遇罗克的前面。

当时十八九岁的高中生，比现在要有头脑得多，主要是有政治头脑，理念也更成熟。不要以为红卫兵都那么狂热，有的是冷静的人。红卫兵运动起来以后，一个多月了，我们学校就一直顶着，全校一致地顶着，就是不成立红卫兵，一直到“8·18”前夕，突然听说毛主席要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四中才匆匆成立了红卫兵。这就是较着劲呢。

文革初起时，也就是在。1966年春夏之际的那3、4个月中，形势变化非常快，简直令人目不暇接。红卫兵是从海淀区的几个重点中学搞起来的。主要是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毛主席见他们敢反对工作组，就想通过他们来打倒刘少奇。乱天下者是红卫兵。所以那一阵儿，江青对红卫兵的那个亲热劲儿，真够让人肉麻的。那时中央文革的那几块料，像陈伯达、王力、

关锋、戚本禹，整天围着海淀那几个学校转，江青今天抱着这个掉眼泪，明天搂着那个擦鼻涕，反复动员和暗示这些红卫兵“小将”们：你们要挖出“中国的赫鲁晓夫”来才算数啊！但那帮“红卫兵”就是按兵不动。没听懂吗？心里明镜儿似的，门儿清，就是装傻：爷昨天造反，今天不干啦！这就是觉悟。江青别看是主席夫人，文革前神秘秘的，文革中一出来就让人腻歪透了。

海淀区的红卫兵是最先起来的。等我们城区各个学校的红卫兵也起来时，他们已经与江青暗顶起来了。城区的红卫兵就是在这个时候走上文革舞台的。这时的红卫兵运动实际上已经很矛盾了。一方面，毛主席号召造反，父母也要我们听毛主席的话；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很躁动不安。

文革初起时的那个气氛，在很多方面都是很合人们心思的。但中央文革做的事，特别是江青那个德行，也实在让人看不过眼。而一些乱象的势头也让一些有头脑的人感到了担忧。所以城区的红卫兵起来以后，做事的风格就与海淀区的红卫兵很不相同。当时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有“创始红卫兵”和“红卫兵运动策源地”之称。我们只能算是第二批。但第二批对第一批却很有些看不上眼。

首先就是对“红卫兵”三个字瞧不上眼，觉得这个名儿太嫩，太小儿科。再就是那一身行头，也就是后来那个著名的红卫兵式军装。不就是人家没有你们有么，显摆什么呢？还戴上袖章，红红绿绿的，盛装游行似的，觉得太张扬，这都不大合我们的心思。所以我们学校就是不成立红卫兵，我们还是打着共青团的旗帜，尽管这时团中央已经没有了。我们学校的校领导不是被学生打倒的，是运动一起来，自己就主动瘫痪的。工作组一来就交了权。工作组也不是被学生打倒的，是被上面撤回去的。这时学校出现了权力真空，于是几个高年级的学生站出来，召集各班的学生代表开了个会，宣布成立联合团支部，以团代党，领导运动。做事的风格也很不同。

海淀区的红卫兵一直都是群龙无首，他们中有一些活跃分子，像卜大华、牛晓平、骆小海、彭小蒙、张承志、陶正，都是红卫兵运动的发起人。彭小蒙一度是江青的直接联系人，江青抱着哭的人就是她。但他们始终没有一个公认的头头。城区则表现出组织意识，八中以陈晓鲁为首，六中以董良翻为首，四中则产生了一个领导集体，为首的是孔丹，成员有秦晓、李三友、马凯、戴小明、周坚、赵胜利等等。这三个学校成为城区红卫兵的主力，但最初都不肯叫红卫兵，而是各有名堂。红卫兵运动起来以后做了很多过激的事，像抄家、破四旧、批斗等等，但是在红卫兵运动的高层，却有过一个非常理智的核心。当时群众造反，有两件事是必做的，一是斗领导，二是抄档案，因为档案中有大量可供攻击的材料。所以很多地方的档案在文革中大量散失。而我们学校是马凯接管的档案，那一阵守着那批档案，管得很紧，四中的档案因而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这在有些学校是很难得的。后来李敖从台湾回访母校，四中能将他的成绩单拿给他看，让他知道当年他是不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四中的，马凯应该说是功不可没。那一阵他们真是干得有权有眼，像模像样的。在那么一个疯狂的时代，这些做法简直就是奇迹。

◇ 处心积虑想要帮助总理去做一些什么

当我们学校作为城区红卫兵的核心力量出现在文革舞台上的时候，我们与海淀红卫兵的背景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如果说毛主席的光辉强烈地照射着海淀红卫兵，那么在城区红卫兵，像四中、六中、八中这几个重点学校，则一直有一个人的身影在浮动，这个人就是周总理。记得当我们终于明白刘少奇已经肯定保不住了的时候，有一次我问李三友，或者是戴小明，我记不太清楚了，我问他们现在该怎么办？李三友抑或是戴小明意味深长地看着我，无奈的语气中透着坚定，说：“还能怎么办？紧跟总理呗！”

这时海淀的那批“首创红卫兵”已经让江青和陈伯达给搞得蔫头搭脑，中央文革整天催着他们去打倒刘少奇，但他们磨磨蹭蹭，避着，躲着，死活也不上那个套。而城区红卫兵起来之后，却是一番气冲霄汉的景象。当时四、六、八三个中学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纠察队”，专门纠察红卫兵。李三友号称“李铁笔”，两个月中连写了十三道“通令”，口气大得不行，不许抄家，不许打人，不许抢文件，不许斗干部，不许这，不许那，居然声动海内，各地的批斗浪潮一时敛息了很多。而这一切的中心思想，就是要保住刘少奇。

也就是在这一两个月中，周总理办公室主任周荣鑫与纠察队建立了联系，批拨了一个办公地点，作为纠察队的总部。董良翮和陈晓鲁都成了纠察队和总理之间的联系人。至少有两个月的时间，也就是在1966年的8、9月间，北京最混乱的时候，周总理通过这个纠察队做了一些别的力量完全做不到的事情。文革中，第一个被群众打死的部长是煤炭部部长张霖之，事情发生得很仓促，令总理措手不及。打手主要来自煤炭学院的大学生。不久冶金部部长吕东又被群众围住，准备带到冶金学院去批斗。当时被批斗的人，一旦落到学生手里肯定没命。这时纠察队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紧急通知，冶金部的干部随后就赶到了纠察队。董良翮已经集合了一批队员等在那里。我们学校的袁塞路和国少庄也去了。他们后来给我讲述了那天的情况，简直是惊心动魄。他们只有十几个人，面对数千群众，居然就挡住了这股洪流。“红卫兵”是毛主席支持的，更何况来的还是红卫兵的“纠察队”。这样对峙了整整一夜，群众才散去。

还有一件事则很离奇，那是宗教学院的学生造反，将香山碧云寺的佛牙掘了出来，说要砸碎，先开大会“批斗”佛牙。也是接到总理办公室的通知，但纠察队正好没人，值班的赵胜利只好只身前往。他赶到现场说明了身份，那里的群众与和尚居然也就让他将佛牙取走了。我问过赵胜利，佛牙是什么样，他说他也没看，装在一个纸盒子里，就用书包这么卷了回来，交给了西城公安局。

在这一段时间里，纠察队处理了不少这样的事。在所有这一切的事情中，都可以看出周总理的影响。纠察队的这些头头脑脑们，眼睛盯着总理，耳朵听着总理，猜测着，揣摩着，分析着，力图跟上总理的思路，只要总理有一点意思就直接出手，处心积虑想要帮助总理去做一些什么，我们今天想起来，仍然可以感到这群忠心耿耿的孩子是多么的可爱。而当时手边有这样一支可以直接影响文革运动的力量，对于四面楚歌的总理又是多么宝贵！

但是后来纠察队却在群众中留下了很恶劣的印象。这里面除了江青、陈伯达和中央文革的妖魔化以外，我们自己也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先是唐双津他们的那些抄家活动，最后则是一些纠察队员不去纠察红卫兵，反而卷在普通红卫兵中一起去造反抄家破四旧，不久，有纠察队员打死了人。这一下事情就闹大了。

#### ◇ 伤痕文学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

文革前，毛主席和刘主席的二元中心在人们的心目中是神圣的革命象征，文革中一朝倾覆，令我们痛心不已。毛刘周的三位一体则是我们的信念，也在文革中四分五裂，同样使我们备受煎熬。在那些所谓的峥嵘岁月中，周总理曾像父亲一样与我们朝夕相处，他神话般的完美人格就近在咫尺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那是令人震撼的人间奇观。很多人直到今天想起他来还会一掬热泪，后来我常想，在那些伤痕文学中，谢天谢地，我直到现在还不认为我的小说也属于此类，人们总是将文革中的人分成两种，一种是整人的，一种是被整的，所以文革的历史就是魔鬼与良善的搏斗。但是在这个历史性的浩大事件中，有没有更复杂一些的人呢？当然有，而且绝大多数的人其实都是这样的。

由于红卫兵死活不肯打倒刘少奇，毛主席终于决定将这些“小将”一脚踢开。这都是一些吃香喝辣惯了的干部子弟，在文革初期又是这样的炙手可热。现在一下子落到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地步，立刻就疯狂了。就我知道的情况而言，红卫兵在溃散以前可以说完全失控了，他们呼啸成群，到处惹事，特别是在群众面前瞎折腾，展现他们的优越感，引起极大的社会反感。这些孩子一边与中央文革对抗，一边和普通群众叫板，丧失了最起码的纪律性。风气就这样败坏了。这不但令群众反感，连我们自己也觉得颜面扫地。

红卫兵和纠察队中的很多人不甘心就这样退出政治舞台，又成立了一个“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参加者都是一些极具叛逆性的成员。这时理智派还想力挽狂澜，但已经没有人再听他们的了。1966年12月26日，“联动”选在毛主席生日那天成立。我去了，那其实是一个狂热的誓师大会。我们学校的李三友、戴小明和张小刚代表纠察队在大会上做了一个联合发言，主张不管运动怎么发展，都要首先承认我们自己的错误。他们这时避免激化矛盾，其实是对的。但大部分人作了相反的选择。北大附中有我一个初中同学叫项东平，原来是一个很腼腆的人，这时却是“联动”的首领。他指着正在发言的戴小明他们对我说：“你们学校是怎么搞的？江青连刘主席都要打倒了，还检讨我们的错误？我们没有错误，是毛主席犯了错误。”我吓坏了，这是我在文革中听到的最放肆、也最勇敢的言论。这其实也正是联动的内部口号之一。我知道红卫兵在劫难逃。那天开完大会我就溜了号，但有几千个“联动分子”前去冲击了公安部，被干警打了个屁滚尿流。联动又反复纠集，前后六次冲击公安部。后来我们听说正是这件事让老人家彻底震怒了。于是从海淀的红卫兵到城区的纠察队，所有首领人物一网打尽。

所以红卫兵运动真的是很复杂的。但我们不管是文学作品，还是历史研究，却没有一篇文章写出过这种复杂性。我们还说要认识历史，从这样的文章中认识不了历史，什么也认识不了。伤痕文学之所以没有历史价值，就是因为它将这些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简单到了幼稚的程度。

文革前的作品就是这样简单化的，将历史归结为善与恶的冲突。文革后，我们的认识还是这样。这就真的应了马克思的那句话：“在经历过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后什么也没有学到。”

□ 摘自北青网《北京青年报》

~~~~~

【史林一页】

## 百问九一三（十五）

• 舒 云 •

### 80、邱会作与九一三事件无关，为什么仍然被抓？

1971年9月12日晚上，周恩来召集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参加人员似乎是有特别安排。黄吴李邱除了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在人民大会堂，另三位全在各自的大院里办公。9月12日前一天晚上的会，吴法宪参加了。吴法宪是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可是，9月12日晚上的会议吴法宪没有参加。李作鹏、邱会作是组员，不参加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合情合理，可是黄永胜参加，吴法宪不参加有些说不过去吧。

总之，9月12日晚上，黄吴李邱中只有黄永胜一人被“隔离”在人民大会堂。李作鹏、邱会作直到9月13日凌晨3时左右，才分别接到周恩来委托的电话，人民大会堂有重要会议，请现在就去。

李作鹏虽然也不清楚，但周恩来电话里要他处理山海关机场的林彪专机，所以他猜到一点情况，心里有点嘀咕。而邱会作在九一三事件前什么都不知道，猜不出周恩来半夜召集政治局委员的紧急会议是什么内容，只是非常奇怪，这么急？听说周总理、黄永胜他们在人民大会堂修改政府工作报告，那也用不着半夜“紧急集合”啊，会不会是倒霉的“庐山”又发作了？可是好长一段时间了，似乎都平静了。从北戴河那边的情况看，更不大像“庐山”。几个小时前，叶群还从北戴河打电话给邱会作夫人胡敏，祝贺邱家有了大孙女，称赞邱会作给孙女起的名字好，还说女儿豆豆订婚了，要胡敏打个电话给豆豆祝贺。这个电话打了起码半个小时，看来，北戴河不会有什么麻烦事，否则，叶群哪有心思给女儿办喜事……可是，半夜人民大会堂开什么紧急会呢？邱会作百般狐疑，被服务员引到人民大会堂会议厅，也没注意是新疆厅还是四川厅。邱会作小声问先到的李作鹏，知道什么事吗？李作鹏说，可能是北戴河出事了。邱会作想，北戴河？林彪出事了？能出什么事呢？

9月13日4时，周恩来向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宣布，今天晚上发生的事，你们不会感到突然吧？接着他提高嗓门说，林彪跑了，他坐飞机跑了。

9月24日上午，黄吴李邱被通知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吴法宪想到要抓他了，因为文革以来，政治局从来不在上午开会，一般都是晚上。所以他到的最晚，安排好了“后事”。

邱会作这一天按计划要陪周恩来到首都机场送外宾。时任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处长的李连水回忆：周恩来通知，送外宾回来，他要与邱会作谈谈，看他的手势，抓还是不抓邱会作。有传说邱会作的车开得太快，周恩来没有追上。这种说法很可笑，但为什么周恩来没有找邱会作谈话，还是个谜。也许是做做样子，布置好的警卫看到周恩来进来后没有作手势，就按照计划，把邱会作抓了起来。

邱会作惊讶极了。在整个九一三事件中，黄吴李邱四大将中只有邱会作最“干净”，另外三位多多少少都有些瓜葛，惟独邱会作对“这一夜”一无所知。1980年审理“两案”时，老战友万毅探监对他说，你没什么事，宣判完你就会出去了。邱会作相信了，连律师也没请，谁知道并没有放过他。

#### 8 1、九一三当天，周恩来为什么召开三次作战会议？

周恩来接到北戴河8341部队转报的林豆豆说叶群、林立果要挟持林彪逃跑的电话后，他返回会议室，要求所有参加会议的人不能外出，也不能打电话。同时在门口布置警卫看守，不让里面的人出来，黄永胜就这样被“关”在了人民大会堂。一直到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从坠机现场回来，从专线电话中报回电报密码，报告机上九人全部死亡的确切消息，周恩来才让所有在人民大会堂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政治局委员回家。周恩来秘书纪东回忆：黄永胜跑得很快，总理让我通知他谈话，我到人民大会堂门口才追上他。周恩来与黄永胜又谈了20多分钟的话，才放他走。

这就是说，9月13日凌晨，周恩来通知所有政治局委员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时，黄永胜早就在人民大会堂。而吴法宪在9月13日零时左右经周恩来同意，去了西郊机场。他一直呆在西郊机场，直到9月13日13时多，吴法宪才在李德生、杨德中的“押送”下，来到人民大会堂。据吴法宪回忆录记载，周恩来、张春桥已经先到了，他们两人同吴法宪紧紧握手，周恩来说：政治局准备集体办公。他和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和吴法宪在人民大会堂，李先念、李德生、李作鹏、邱会作在京西宾馆，康生、江青在家里。很快，江青也来到人民大会堂，她也同黄永胜、吴法宪紧紧握手。她手里拿着一副扑克，要张春桥、黄永胜和吴法宪一起在东大厅玩。吴法宪很奇怪，都什么时候了，还打牌！是想试一试我们的心情吗？反正我心里没鬼，



打就打！就这样，我们四个人一起打牌，结果我和黄永胜一头赢了。江青看我们没有异常的表现，就出去了。

吴法宪回忆：不久，周恩来进来，要黄永胜准备一下全军的作战部署，同时要我们通知副总长阎仲川和总参作战部人员一起来参加研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我要秘书张叔良打电话告诉空军作战部和雷达兵部，要他们立即准备空军的战备情况和防空作战预案，向我汇报。18时，空军雷达兵部一个处长向我汇报了雷达兵部的部署情况，并带来了作战防空部署图。我听完汇报后，又进一步考虑和准备意见，准备晚上向周恩来和黄永胜汇报。

9月13日21时，周恩来召集黄永胜、吴法宪、阎仲川和总参作战部的人一起开会。首先听取阎仲川的汇报，然后听取吴法宪的汇报。黄永胜提出，南口方向没有部署部队，这是一个空隙，应该立即调一个师去加强南口的防御。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说，黄永胜提出的这一措施，经毛泽东批准，马上进行了实施。被架空的总参谋长黄永胜不知道，副总参谋长吴法宪更不知道，其实早在9月12日下午，毛泽东刚回到北京，就布置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调一个师到南口布防，黄永胜的建议早就是马后炮了。

在9月13日晚上的作战会议上，周恩来、黄永胜都认为，空军现在的防空部署比较恰当，特别是对苏联的防空作战部署很好，不要再作变动，主要是提高警惕，防止空袭，防止飞机外逃，要作具体的布置，包括空军、海军、民航的一切飞机都不准起飞，不许再有一架飞机外逃，要坚决堵住一切漏洞，坚决守住空中防线。这些都是空话，其实与南口驻军一样，早在9月13日凌晨，北京卫戍区的部队已经进驻北京的各个机场，部队到位后，早上8时多，周恩来才对吴法宪说，已经决定对空军、海军的机场，以及海军的码头各进驻陆军一个营，以保证安全，防止外逃。

黄永胜、吴法宪参加的作战会议开完，已经是9月14日凌晨3时30分了，周恩来要黄永胜、张春桥、姚文元住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要吴法宪和他住在东大厅。而黄永胜、吴法宪仍然不知道，9月13日下午，在他们这个所谓的作战会议之前，周恩来还召开了另一个紧急作战会议。

9月13日凌晨到下午，周恩来派李德生到空军，纪登奎到北京军区空军，李先念、华国锋等分头到京西宾馆、海军司令部和总后勤部主持工作。并亲自打电话给11个大军和29个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通报林彪外逃：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会上首先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往蒙古。我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战备！

所有该打的电话都亲自打完了，周恩来让秘书纪东通知总参五位副总长张才千、阎仲川、王新亭、彭绍辉、陈健德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参加作战会议。这个会议总参谋长黄永胜和副总长阎仲川参加没参加，还有待进一步查证。如果黄永胜参加了，吴法宪怎么没参加？如果阎仲川参加了，怎么他在晚上再一次参加作战会议？阎仲川不会怀疑吗？为什么前一个作战会议不让黄总长、吴副总长参加？所以笔者倾向黄永胜、阎仲川没有参加9月13日下午的作战会议。

周恩来在下午的作战会议上，除通报林彪外逃外，还拟定向全军发出紧急战备指示，部署了对北京地区的军队部署、京郊机场的军管，以及机动兵力的安排。周恩来要求副总长们坚守岗位，加强值班，说他现在考虑的第一是打仗，第二是打仗，第三还是打仗。因为这时，中国还不知道256三叉戟上的九人是死是活。

周恩来在9月13日白天还召开了一个具体的作战会议。因为256三叉戟出境后，总参、空军等有关部门报来的情报中，有一个异常情况，中蒙边境414界桩附近，蒙古的雷达联络

频繁。周恩来让秘书纪东通知空军、通信兵和总参有关部门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汇报，并要求带有关资料和地图。周恩来仔细看过我方和蒙方的兵力部署、雷达分布后，初步认定，蒙军雷达活动异常，与林彪飞机有关。周恩来预感，蒙军在这个地域雷达频繁联络，有重大情况发生。提出加强这一地域的资料搜集，认真进行分析，有什么异常及时上报。

看起来，这个会议也绕开了总参正副总长黄永胜和吴法宪。

也就是说，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当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三次作战会议，而身为总参谋长的黄永胜和副总参谋长吴法宪，只参加了一次，而且是装模作样的虚伪的一次。

## 8 2、九一三前一天上午，林彪为什么想见美国总统尼克松？

林彪一向不喜欢出头露面，更不喜欢与外国人打交道。他曾对警卫秘书李文普说：跟外国人说话要特别注意，不管你说什么，他们都会给你登报发表。所以林彪一向慎见外宾。1970年庐山会议后毛泽东曾让林彪接见斯诺。林彪曾在延安接受过斯诺的采访，而此时已经今非昔比，那时林彪是毛泽东宠爱的战将，现在他刚从摔了跤的庐山上下来，谁知斯诺会问什么问题。林彪拖了几个月，最后还是没见。

林彪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是1971年6月3日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毛泽东接见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林彪作陪。会见还没有结束，林彪就悄悄躲到湖南厅外面西北角的椅子上，直到毛泽东和外宾离去，他还坐在那里。

可是林彪在北戴河，却一反常态，非常关心中美关系的进展。有关中美关系的文件，如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中美间所有口信来往，中央工作会议发的文件，总理同基辛格会谈的简报，以及总参三部编的国际问题资料，事无巨细，林彪让毛家湾统统送来。联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林彪认为新中国应该同美国搞好关系，这对新中国的建设大有好处，可惜中美为敌20多年。现在美国总统尼克松主动伸出橄榄枝，我们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了。

林彪几次提出他要见美国总统尼克松。9月12日上午，林彪又说过一次，他要见尼克松。这天半夜就要“仓皇出逃”了，还有情绪关心“八竿子打不着”的尼克松？这合情合理吗？

惟一的解释是林彪根本就不知道当天夜里要外逃。

## 8 3、林彪在北戴河的最后三个月有反常行为吗？

林彪下了庐山，先到北京，然后很快就到了北戴河。

自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一直称病不出，既不批陈伯达，又不检讨。

1971年2月12日，林彪到苏州养病，叶群和林立果陪同。

2、3月间，林彪到北戴河。林办工作人员都觉得奇怪，以前都是天热了才到北戴河，现在天这么冷，怎么去北戴河呢？却不知林彪是为了躲北京的批陈整风会议（华北会议）。

3月26日，周恩来派专人将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送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批陈整风会议情况和毛泽东多次的批陈指示，以及拟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安排等。林

彪表示很好，但仍不出山。

3月30日和31日，周恩来带黄永胜等六人到北戴河林彪处谈话，汇报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情况，及毛泽东批示等（林彪专门有个讲话，9月被制成中央文件，都印好了，还没有下发，九一三事件后作废。但奇怪的是也没有批判，无声无息了）。

4月19日，林彪因北京的多次催促，终于回到北京。

4月20日，周恩来致信林彪，送去有关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材料及毛泽东的批示，希望林副主席能出席会议，并讲几句话。林彪不表态。

4月24日，周恩来再次报告：希望毛主席、林副主席能见大家一次，如能给大家讲几句更好。毛批示：我这几天不出门。林彪还是没有表态。

但是，林彪多次求见毛泽东，想当面谈谈，都没有回音。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

毛泽东南巡中反复说：对林彪还是要保，还是教育的方针。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而实际情况是，林彪几次要找毛泽东谈谈，毛泽东却闭门不见。李文普说，林彪心情不好，曾要求面见主席。当时，毛泽东那边的电话至少是叶群打，我们林办有传闻，林彪想与毛主席见一下，谈一谈。但是长时间毛泽东不作答复。

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下了庐山，到南昌呆了两天，就回到北京。直到1971年8月14日南巡前，哪里都没去。毛泽东为什么一直坐镇北京？这似乎有点怪，不太符合毛泽东的性格。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毛泽东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正酝酿着一场新的“风暴”。

5月1日焰火晚会，毛泽东到了，林彪还没到，平时都是林彪先到。周恩来往林办打电话，林办秘书说，首长身体不好，上午的活动已经参加了，晚上就不参加了。文革中上天安门是政治亮相，毛泽东出现，林彪不出现，马上国内外就会“地震”。周恩来坚持要林彪来，直到晚会即将开始，林彪才到。毛泽东虽然和林彪面对面坐着，却没有与他打招呼，只与坐在身边的西哈努克有说有笑。电影摄影师一直等着毛林谈话再开机，却没想到，林彪闷闷地坐了几分钟，离席而去。电影根本没开机，摄影师只是拍了一两张照片，周恩来为此着了一阵子急，但是也毫无办法，只好用了一张平时根本不可能用的新闻照片。从这张照片看，林彪低着头，满脸病容，毛泽东与西哈努克有说有笑，仿佛林彪根本不在场一样。

6月9日，为了能见到毛泽东，林彪到钓鱼台“讨好”江青。江青借机要给林彪照相，林彪一向讨厌照相，更讨厌江青，但此时他不得不低头。林彪根本没有照相的准备，连胡子都没刮，借江青秘书杨银禄的刮胡刀刮了胡子。可江青“麻烦”，照了一遍又一遍，反来复去，这才照了那张看“宝书”的大照片，登在《解放军画报》7、8期合刊上。

可是，林彪就是这样被江青折腾，还是没能见上毛泽东。

6月15日，林彪乘专列到北戴河，到9月13日差两天三个月。除了八一建军节前坐飞机到北京参加八一招待会外，林彪一直封闭在北戴河，哪里也没有去过，也没有主动和任何人接触。据在北戴河警卫林彪的8341部队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说：我们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现象，只是觉得我们保卫的这位副主席从庐山下来后，情绪不那么好，整日愁眉苦脸，不见一丝笑容。他外出活动原本就很少，这一段就更少了。

中央警卫团团团长张耀祠说：事先没感觉林彪搞政变。他那个身体，白天晚上，觉也睡不好，成天蹲在房子里不出来。

九一三事件前，林彪嗓子有点痛，为了能让林彪在国庆节发表讲话，301医院派了几个耳鼻喉科专家来给林彪看病。不久前，我见到了最后给林彪看病的常汉英教授，她说：毛主席怎么选这么个接班人，林彪这样的身体怎么能够接班？

当然，在现代化条件下，蹲在房子里不出来，也一样可以搞“政变”。可林彪林彪在北戴河，不仅很少外出活动，更不打电话，也没有接过电话。林办秘书说：林彪除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电话，一般电话都不接。电话都是叶群“专利”，就是周恩来打给林彪的电话，也常常被叶群截住。

不接电话，不联络人，林彪怎么搞“政变”？怎么能当“政变”的统帅？一个人就搞成政变吗？换句话说，林彪天天“窝”在房子里，像搞政变的架势吗？

84、林彪、叶群和林立果是一回事吗？

按说，林彪、叶群、林立果是一家人，一家人还能不是一回事吗？

但很多事实证明，叶群、林立果在骗林彪。

1970年春夏，林立果从庐山下来后，和周宇驰等人商量，争取和平过渡，但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除了写个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在上海空4军组建教导队外，林立果还到深圳、沙头角拍摄了大量的地形照片，并察看了九龙的地形。到目前为止，林立果的这些行动，并没有林彪知道的证据。

林立果的“三个方案”，上策暗杀毛泽东，中策南飞广州，下策北飞苏联。毛泽东南巡突然回到北京，林立果想在南方暗杀的“上策”还没有出笼，就夭折了。他方寸大乱，马上让周宇驰等人商量“中策”，到广州另立中央。林立果则飞回北戴河，准备9月13日早晨分别飞往广州。9月12日晚上，王飞等人在空军司令部大楼召集会议，拟定南飞广州的名单。会议开到一半，因周恩来查问西郊机场的飞机，也匆匆夭折。最后，只剩下“下策”——北逃苏联了。

叶群知不知道？林彪知不知道？

江腾蛟出主意，叫林立果调关光烈来北京，商量调火焰喷射器。叶群不知道，她质问王飞：为什么叫关光烈到北京？你找他有什么用？谁让你们找的？这说明林立果和叶群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叶群是否完全知道林立果的“两谋”，似乎也要打上一个问号。

至于林彪，对一切事情都不闻不问，他知道林立果的“两谋”吗？他向谁布置政变了吗？他有关于政变的指示吗？一切都没有证据。按照张清霖的说法，他们这一家三口人，是一个骗一个，叶群骗林彪，林立果骗叶群，而林彪什么都不知道。

是谁在鼓动林立果？林立果在北京“热火朝天”时，北戴河却一切如常，林彪身边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人参与“两谋”，也没有一个人揭发出林彪搞政变的阴谋。否则，1975年结束的团河学习班“学员”不可能都分配工作，有军籍的林办工作人员仍由总政治部统一分配。

9月12日，林豆豆想了解北京捎来什么东西，问李文普，天冷了，有没有带棉衣？有没

有到银行取钱？李文普说得很肯定，没有，什么也没有带。

就这样慌慌张张逃跑国外吗？

#### 8 5、林彪手令”怎么会有横竖两张？

九一三事件前见过“林彪手令”的人比见过《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人多，现在不少人还活在世上。可是，人们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林彪手令”有两个。这不奇怪，因为除了林立果和周宇驰外，没有人同时见过两个“林彪手令”。出现在法庭上的，是周宇驰身上的那个，撕毁后又被拼起来的“竖的”。周宇驰身上的这张“林彪手令”被拍成照片，作为林彪“发动武装政变”的“铁证”，广为宣布。林立果身上还有一张“横的”，被他带上256三叉戟，至今仍不知在何处。这个“横的”看到的人很少，但至少胡萍和关光烈看见过。

林办秘书于运深第一个看到“林彪手令”，那是林立果刚从北戴河飞到北京的那个晚上，于运深认为是叶群与林立果之间有矛盾了。这时可能还只有一个“林彪手令”，于运深看到的是“竖的”，而且也没有夹在红本子里。很快林立果发现一份“林彪手令”不够，因为林立果和周宇驰经常要分开活动，需要一个人拿一个当“圣旨”，于是再“创造”一份。“林彪手令”上写两个人的名字，与“林彪手令”有两个一样，对谁有利呢？这是不言而喻的。

为什么弄成“竖的”和“横的”？一模一样不更好吗？或许是忙，没想那么多的细节？也可能是先写了一个“横的”，不太像，再模仿一个“竖的”。模仿也不那么容易，先模仿的“横的”也没舍得丢掉。

9月12日傍晚，林立果在去北戴河前，从上衣兜里掏出来的一个小红皮本，小红皮本里夹着一张“横的”给胡萍看。这个小红皮本，大概是讲用报告。在坠机现场，孙一先看见过，说明没烧掉。因此可以推论，夹在小红本里的“林彪手令”肯定也没烧掉。但是孙一先看时，小红本里已经没有“林彪手令”。可以认定，这个“横的”被苏联人拿走了。虽然现在没人提起，但愿它早日“浮”出水面。

林彪会写两个“林彪手令”吗？

“林彪手令”上只有一句很含糊的话，“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按什么“命令”办？含含糊糊，还不是凭他们的一张嘴胡说。“林彪手令”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意思？“林彪手令”是真实的吗？是谁写的？写给谁的？为什么会有“横的”和“竖的”两种“林彪手令”？文革后林彪几乎很少动笔，文件圈阅也常常由秘书代笔，怎么可能一连写两张“林彪手令”？如果是林彪写的“林彪手令”，也不可能写两个；就是写了两个，也会毁掉一个，不可能让林立果把两个都拿走。

被周宇驰撕毁的还有林彪的一个“亲笔”纸条，是写给王飞转交黄永胜的。黄永胜在法庭上否认看见过这个纸条，王飞也否认看见过这张纸条。这个纸条与周宇驰无关，怎么会在周宇驰身上？这是不是也能为两个“林彪手令”做点注脚呢？

#### 8 6、林立果回北京看牙，为什么要瞒着林彪？

1971年9月8日，李文普说：林立果突然去北京看牙，叶群对我说要瞒着林彪。林彪并没问林立果到哪里去了（因为这一家人并不是天天见面，几天不见的事情是家常便饭）。晚上，林立果从北京打电话，说平安到达。我马上报告林彪、叶群，林彪点头说好。当时我感到林彪

是知道的，叶群有意说假话骗我。

在当时，林立果到北京看牙是件平常的事，9月2日林立果就到北京看过牙。只因为他在北京策划政变，才使他回北京成了“政治”。而当时李文普不可能拿“政治”眼光去想这件事。所以李文普的这段话非常矛盾，林立果到北京看牙，叶群为什么要瞒着林彪？既然叶群要瞒林彪，对李文普又有交代，李文普就不可能当着林彪的面对叶群说林立果平安到北京了，他敢违背叶群的意思？本来李文普和叶群的矛盾就很深，要是依着叶群的意思，早把李文普赶走了，只是林彪已经习惯了李文普，不放李文普走，叶群没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李文普当着叶群和林彪的面说了林立果回北京看牙，你李文普只是感到林彪知道，林彪一向宠辱不惊，面无表情，林彪听明白了吗？真的知道吗？就是林彪知道林立果到北京看牙，又有什么呢？他知道不知道林立果借看牙到北京搞“两谋”呢？

张清霖回忆：9月8日，林立果跟林彪说回北京看牙，林彪不让去，只让守在北戴河，所以林立果是悄悄走的。叶群知道，在林立果走之前与林立果谈了半个小时。我当时与杨森（空军保卫部处长）商量把林立果扣住，杨森不表态，就算了。

如果真把林立果扣起来，林彪会不会出逃？九一三事件会向怎样的方向发展？

可是，谁敢把林立果扣起来？张清霖如果敢，他可能就不会与杨森商量。与杨森商量，如果杨森同意，那么杨森就要负责任，杨森哪里负得起这个天大的责任？

其实，最主要的是北戴河没有人敢对林彪说！

（未完待续）

□ 选自 舒云\_新浪博客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